



现代出版： 理论与实务

第七辑

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科学研究中心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第七辑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编.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622-4607-7

I. ①现… II. ①华… III. ①出版工作—文集 IV. ①G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087 号

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第七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 ⑥ 编

责任编辑:董中锋 责任校对:张晶晶 封面设计:罗明波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酱印:章光琼

字数:150 千字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125

版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纪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

黄永林副校长的讲话	(1)
范军社长兼中心主任的讲话	(3)
蔡学俭顾问的讲话	(7)
王先霈顾问的讲话	(13)
雷绍锋社长的讲话	(18)
胡亚敏院长的讲话	(20)
王泽龙主编的讲话	(23)
罗紫初教授的讲话	(25)
吴永贵教授的讲话	(28)

我国的出版标准化政策与中小型出版社的标准化战略

.....	夏兴通 (30)
教育政策与中小学教材选题的策划	李 蓉 (38)
浅谈出版政策调整及资本运营方式	刘满元 (44)
书号实名申请的实践价值探析	王敬敏 (54)

守住文化之根 丈量民族之魂

——《经典常谈》常销缘由解读	何国梅 (61)
----------------	------------



浅析《经典常谈》的常销

- 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入手 向司林 (69)
三十年代商务版“大学丛书”的策划与运作 范军 (76)
《重难点手册》畅销分析 刘和平 胡小忠 (93)
从《信息技术》教材的发展轨迹看选题生命周期的影响因素
..... 梁上启 (99)

《初中数学竞赛同步辅导》修订的着眼点

- 涂庆 胡小忠 (107)

大学出版企业的追求

- 关于文化责任之外的思考 严定友 李农浩 (111)
孙洙《唐诗三百首》选本的文化取向 张毓茜 (118)
中国盗墓类小说的社会性思考

- 以《鬼吹灯》为例 徐婷婷 (124)
从《沉思录》的热卖看腰封的行销作用 徐大庆 (134)
浅析《今古传奇·武侠版》编辑的读者意识

- 龚齐飞 向司林 (139)

-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例说 董中锋 (149)
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 董中锋 (158)
注释的构成及其规范 董中锋 (165)
“作”与“做”辨 周柏青 (171)

附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大事记（1999—2009）

- (176)

后记 编者 (187)

黄永林副校长的讲话

很高兴参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暨出版政策研讨会。各个单位都很忙，各个单位的领导事情也多，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会议，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借此机会向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长江出版集团以及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兄弟院校的领导、专家多年来对我们学校，特别是对我们学校出版社及出版科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是在王先霈老师的倡导下成立的，十年来，为学校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版科学研究中心秉承“以学术促生产，以学术促管理，促进学校学术事业的发展”的宗旨，在这十年里，不仅出版了一些关于出版科学的论文和相关著作，而且承担了国家和湖北省大量的出版科学研究项目，尤其是这些项目为国家的出版政策的制定和出版理论的繁荣，特别是为我们学校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我代表学校向出版社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的这个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以出版社为主体，又以文学院、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为教学科研基地。出版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既塑造出了出版单位的学术形象，提高了华师出版社的学术品位，为华师出版社提供了科研和理论的支撑，同时又为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然，我

还要为我们这个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未来的发展谈两点希望：第一，要加强出版产业的理论研究。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只有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才有可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出版产业发展很快、现代媒体发展很快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促进我们出版事业的发展。第二，要加强交流。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出版科学研究中心跟国内特别是武汉地区同行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但跟国外的交流还比较欠缺。我们说我们学校要办国际性的大学，我们出版社也要办国际性的出版社，只有走出去，走到国际上去，站在国际的平台上、以国际的视野来对待我们的事业，来看待我们的发展，我们才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做得更好。因此，我希望大家多走出去进行交流。

最后，我再一次祝愿，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越办越好，我们出版社的事业越来越兴旺。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祝各位领导、专家，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新年愉快，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谢谢大家！

（黄永林，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何国梅根据录音整理）

范军社长兼中心主任的讲话

大家上午好！时光荏苒，岁月更替。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共聚一堂，纪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并进行有关出版政策的学术研讨。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出版科学研究中心向莅临会议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多年来支持和关心我校出版科学的研究领导和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

十年前，由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王先霈教授倡议并担任主任的华中师范大学编辑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五年后，根据出版业形势的发展和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中心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十年来，研究中心在推出学术成果、培养专业人才、促进学科建设、开展对外交流、营造企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出版学术界和业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学术成果方面。研究中心的生命是学术。十年来，出版科学研究中心积极组织学术活动，不断推出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仅出版社的中心成员就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内的 10 余项研究课题，公开出版相关论著 20 多部，在核心期刊（CSSCI）发表论文 100 余篇（年均 15 篇左右），40 多篇次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编辑研究》辑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出版业》等转载。多项成果获得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的优秀成果奖励。中心定期推出的学术辑刊《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已出版 6 辑，受到业界和学



界的关注与好评，南京大学出版专业还将其列入博士、硕士生教学参考用书。

培养人才方面。研究中心在学校和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从1999年开始招收编辑出版方向硕士研究生。至今已有近30名毕业生活跃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知音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各种媒体和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的新闻传播教学科研一线。他们中有多人获得“未来编辑杯”的奖励，有的已经成为出版企业的金牌策划人、高等院校的骨干教师。目前中心在读的还有近30名研究生。他们在产、学、研的良好环境中接受教育，成长迅速。人才成长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出版企业在产、学、研的结合中，人才队伍水平得到提高，影响得到扩大。中心成员有8人次，或入围国家级、省级人才工程，或获得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或荣获省政府、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重要奖励。

学科建设方面。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设置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和开设编辑出版学课程的高校有216所，涵盖国内大部分省（区、市）。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一些高校利用国家规定在一级学科授予权下可以自主设置博士、硕士研究生学科专业的政策，利用自己一级学科的优势，自行设置了编辑出版学专业，或设置了与这一学科相关的专业。目前我国共有7所高校在8个办学点招收编辑出版学或类似专业博士研究生，47所高校在54个办学点招收编辑出版学或类似专业硕士研究生。我们研究中心作为专业方向之一，配合文学院，2006年申报并获批了传播学硕士点。2008年，同样作为专业方向之一，配合历史文化学院和国家文化产业基地，申报并成功增列了“历史遗产与文化产业”博士点。这既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综合发展作出了一份贡献，也为研究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更好的平台。

对外交流方面。中心在多次邀请国内业界学界名家，如罗紫初、周百义、彭松建、钱文霖、张志强、方卿等来访和演讲的同

时，注重加强与境外、海外的出版学术交流。中心成员提交论文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国际出版学术讨论会，出席在日本的中、日、韩大学出版论坛并作为中方两名代表之一发表主题演讲，在美国纽约大学与该校出版研究中心成员进行交流，本中心的顾问之一韩国出版学会会长、惠泉大学教授李钟国先生应邀来访并作学术报告。中心目前正在策划的“出版学建设丛书”就把境外、海外优秀著作的引进和推出作为重点，首批即将出版的就有台湾商务董事长王学哲（王云五之子）的《百年商务经营史》、日本学者的《中国出版文化史》。

营造企业文化方面。研究中心主要依托出版社。中心在出版社“培养专家型员工，打造学习型企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定期出版的学术辑刊，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自我提升的园地，同时也切实地解决了一些员工在职称评审、职员晋级等方面的问题。中心先后主持召开或承办的“出版品牌战略研讨会”、“出版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研讨会”、“新形势下编辑工作创新研讨会”等，活跃了学术氛围，培育了文化精神。出版的本质是文化，出版的贡献在产业之外。培育一种出版企业的文化精神的确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出版科学研究中心的成员不限于出版社。学校的各个杂志社、校内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新闻传播学系、信息管理学系的教师都还有一些相关成果，也有不少的学术活动。我们没能一并总结。研究中心从主任到普通成员都是兼职的，没有领取任何报酬的。大家在繁忙的出版管理、经营、编辑工作之余来做学术研究和相关事情。没有轰轰烈烈，只求细水长流，十年来也有一些积累，有了一些收获。

我们知道，出版属于文化产业的核心层。随着出版业改革的深入，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我们研究中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了一点影响，但仍然有很多不足。以后，中心将抓住国



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机会，在学校的统筹规划和大力支持下，进一步在充分依托出版社成员的基础上加强校内各方面研究力量的整合，在继续发挥个体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团队协同研究，在继续保持出版文化研究特色的基础上加强出版产业研究，在继续保持出版史研究特色的基础上加强出版现实问题研究，在继续保持以编辑出版为重心的基础上加强整个文化产业的多角度、多层面研究，凝练学术方向，形成学术品牌，力争使中心在推动学校出版事业发展、出版产业壮大、文化产业研究繁荣和新兴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期待省新闻出版局、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和兄弟出版单位的一如既往的关心与支持！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很快就是元旦佳节了。借此机会给各位送上新年的祝福。南宋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祝愿大家天天好心情，岁岁好时节！

（范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蔡学俭顾问的讲话

今天来参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会，非常高兴。

出版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真是想象不到的。我刚从事出版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出版搞什么，人家都说出版是出模板的地方，不晓得出版是搞什么的。谈不上出版学，谈不上现在的大专院校，刚才范军同志说，一百多所大学设立了出版专业，这么多博士、硕士。而且现在出版培养的学生比较热门，找工作的话不是那么困难，（出版）已成为大家追求的一门职业。出版社的规模也不同了，过去的出版哪有规模，我刚到中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那里大概加起来不到 50 个人，我们那个编辑部 18 个人，规模很小。发展到现在，现在的出版的内涵和外延都大大地拓展，它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什么叫出版？数字出版、手机出版已经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到每个人的生产、生活当中，不是我刚参加工作时那个出版的概念，你每天都要跟出版打交道的。现在这个手机扫黄，新闻出版总署有个扫黄办公室大得很，过去哪里有这种事情，我们过去扫黄不扫手机。现在的出版，责任非常重大，地位非常高。搞出版的人也比较受到重视，我们那时候默默无闻，为他人做嫁。现在的出版为他人做嫁却不完全是，出版社现在编辑出名的不少，所以我经常跟我们后来的同志说，我说你们生在一个好的时代，我们搞出版的时候没有这么好。所以现在把出版设置为一个中心来研究，这个过去也没想到。华中师大这



样的出版中心在全国也不多，大概南京的张志强可能有一个，不晓得它的规模怎么样，好像没有什么活动，再一个苏州大学老吴那里，他也带了几个研究生。真正一个大学出版社依托大学的优势，来长期以来搞出版研究来搞出成果出来，这个可能也就是华中师大出版社。

那时候我编了个刊物叫《出版科学》，有人当时说：“出版科学？叫这么个名字！”人家不把出版当科学，有人说不会有太多文章。现在的“出版科学”多了，华中师大的研究中心改成了“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我感觉到欣慰。一个搞出版搞了几十年的人，从那个时候看到现在，有幸看到现在，这个心境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里，今天开这个会，我说我一定来参加，不仅说我是顾问，凡是这样的活动，我绝对参加。这几十年的工作，我感觉自己也比较自豪。有些年轻的同志不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当时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这里，一个是表示祝贺，一个是看看老同志，看看老朋友，我现在这个闲云野鹤，华中师大的同志能邀请我参加，我也感到很荣幸。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哪里找我去我都会去，每次去我都能看到些人。华中师大出版社对我也非常关心。

现在搞出版改革，我觉得华中师大现在这种办社的理论和实践，我都是非常欣赏的。现在是搞什么？规模效益。出版转企、改制、上市，热热闹闹。现在的出版社的编辑对出版研究是不大重视的，重视的是经济，很多政策的引导、指导、导向也是经济。我不说名字，我到过一些出版社，也了解一些出版社的情况，那些编辑一天到晚关心的是年终拿了多少利润。这个出版中心搞了十年了，一点报酬都没得，而且不占用工作时间来搞研究，所以坚持这个文化本位在华中师大出版社是非常正确的，它的风气正、人正，办社的路子正。如果一个出版社办社就坚持这种方向，文化本位，好读书的、搞研究的，毕竟它的风气是正

的，它的办社路子是正的。

我现在对这个政策研究谈点我个人的看法，我现在没有机会在别的地方谈，就借这个机会我想讲一讲。现在我们出版界主要的是这几件事情，出版体制改革，转企、改制、上市，我们的黄（嗣）博士专门研究这个，而且《中国新闻出版报》也登了，2010年是决战之年。体制改革要决战了，不仅有路线图，还有时间表，统统都要改过来，除了个别少数，中央人民出版社还有其他少数外都要转成企业，重中之重。再一个是数字出版，数字出版不动是不行的。这两个东西，哪个最重要？我最近看了篇文章，说这个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比生产力的发展，比数字出版还要重要。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很简单的道理，体制改革，我们是改什么？改企，改制。在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它已经都转制了，它不存在再转到哪里去。它现在搞什么呢？数字出版。因为现代出版和传统出版不同，发展得非常快，不可想象的，如果你再不发展数字出版、发展生产力，你的出版要落后的。我们之所以说要转制改企，从理论上来讲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我们现在把体制改好了，再去促进生产力，这样子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出版的差距就会拉大。现在的出版部门，据我了解，数字出版落后得很，很多东西都不懂，我当然不懂了，现在在职的、有权的就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上面来。数字出版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出版的数字化，搞几个数据库，搞几个网站就是数字出版了，不是这回事。你看现在发展得多快呀！所以我觉得当前，一个数字出版，一个体制改革，要很好地寻找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点，不要轻此重彼。现在我的看法是，我们出版政策指导上一股脑就是改制改制改制。现在改了，我们大学出版社都改了，湖北的大学出版社都改成功了，但是改成功了有什么变化呢？是不是已经是现代企业制度了？转企后，是企业了，那改制呢？按现代企业制度，干部你要董事会任命啊，不能

上级任命啊，也不能随便调动啊，那就要董事会、经理、总裁，你现在既无董事会，又没有什么东西。现在的集团，一转制更加突出了。我当过出版局局长，我决策的时候要经过党组同意，不是局长同意。现在的出版集团，老总一个人说了算，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上市就更不用说了，上市条件根本就不具备，一直要吵着上市的那些企业，根本不具备上市的条件。为什么要上市呢？上市可以拿股票。北方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一上市就涨到7块、8块，1块钱的原始股可以涨到7块、8块。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包括文化建设上，有一种倾向，我现在对毛主席说一句话就是，当然我非常尊敬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我们现在看来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一天到晚抓生产关系的改变，土地改革，合作化，一晚上合作社就组成了，公私合营也是敲锣打鼓，没有个把月就搞成了。为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1958年，亩产1000斤、10000斤粮食。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比如1949年我们革命成功了，但是不能老在这个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打主意，而在发展、不在生产力上打主意。所以1958年大跃进搞得饭都没有吃的。人民公社成立了，从生产队改到人民公社，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合作社化了。浮夸，因为你搞这个东西，浮夸就来了，说假话的来了，说真话的少了。我就想着我们现在的改制有点像大跃进，过去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你的条件成熟了就改，不成熟就不改。现在路线图、时间表非常具体，“如果你今年年底不转制就把你的牌子撤了”，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文化意识的工作高过文化工作、高过出版工作，它是一个过程，不能采取行政命令来办出版、办文化，它有它的规律。现在用这种方法，用行政的办法强化行政的领导、要求，再下一步音像出版社也要改了。大

学出版社现在是改了，大学出版社现在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是改了和不改差不多，你改了，你的人员还要学校任命，你是不是企业呢？华科大出版社是企业吗？武大出版社是企业吗？就改了个出版社的章子。那假话就出来了，你想我们出版界讲真话的多不多呢？教育界还有几个老同志。出版界，我也不在报上发表，我就讲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体制改革不要搞得那么急于求成，不要那么急功近利，要尊重出版发展的规律。你说这个大学出版社要转制，不转制就撤销，你说有必要吗？大学就是个事业单位，整个事业下面是个企业，搞得好好，你非得要搞……

所以今天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整个出版政策上是不是要更加注意数字出版，这个必要性我写了很多文章。一个出版社，如果数字出版不跟上去，快得很，再等，再过五年八年十年肯定是落后的，中国的出版业肯定是要落后的……

整个出版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不前了？现在说是集团改革也好、出版企业改革也好，整个我们国家的出版业，光是传统出版、图书出版的生产规模、效益、销售量是缩的，不是涨的。很多数字是可以说话的。我可以介绍一下，我当局长的时候，我们湖北的出版系统的纯利润是两个亿，2001年秋天邱久钦当局长的时候，纯利润是3个亿。我不谈物价因素，那时候我们算的这个利润不包括地县，不包括现在长江出版集团的那些规模，它的规模比我们要小一些，但它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规模。为什么？很大一个原因是物价的因素，再一个就是计算的口径。要真正讲真话，我们整个出版业这个体制改革并没有促进出版的增长。所以在处理关系上要用辩证法，要有好的作风、听真话的作风、辩证法的作风，要调查研究真实情况……温家宝同志最近跑了好多地方调查、听真话……我是讲这个实在的情况，讲我个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我在中国版协老年委员会上，我是版协老年委员会的委



员，包括王益、王仿子，在那个会上我也讲过我的观点……我觉得在出版政策上面，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当然还有别的问题我就不讲了，比如多元化的问题。出版集团到底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什么叫多元化？出版产业的多元化，我的理解，就是把出版的主业从传统的报刊发展到互联网、网络媒体，这个是多元不是单纯的传统的媒体，而是搞成一个完整的出版产业链。现代出版是什么？现代出版就不是传统出版。我们现在多元是什么？除了图书以外，搞房地产，搞股票，搞餐馆，搞汽车交易，这叫多元化吗？搞自己不懂的东西。所以出版企业它的主体应该是出版，如果出版的产业发展的主体不是出版，非出版成了主体，那你就是上百亿、上千亿也不是出版改革所希望出现的出版……所以，多元化也是要注意的。

出版在十七大的报告里面讲到：内容创新、体制创新、手段创新。这是出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经途径。体制创新是什么呢？体制及时改革，手段创新就是数字出版，内容创新就是不管你 how 创新，最后你提供在内容上面。搞了半天，你出版物的内容上不好，那也不行。所以归根结底，这三样东西，我觉得十七大规定的这三项是非常正确的。只要紧紧围绕这三个创新，出版工作就可以上去……

（蔡学俭，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编审。本文由庄鹏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王先霈顾问的讲话

接到出版社的通知，有这么一个活动，引起了一些回忆，也引起了一些思考。我作为出版社的一个老编辑，一个老员工，我觉得华师出版社还有这个研究中心是湖北省这个大的环境下，在出版局的关心之下，在本地同行的鼓励、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过去出版界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很好的传统。我们国家的出版在20世纪前期出现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出版家，比如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可以数出很多人。然后50年代以后，就没有出版家了，不需要出版家，也不可能出出版家。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人才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也没有经济的压力，然后政治上是严格的控制，出书就是了。有非常杰出的学者去当出版社的领导，但是没有出版家。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情况变了，干出版工作如果不作研究其实是不行了，但是研究的风气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

我觉得湖北出版界有一个很好的条件，蔡学俭他们这一辈当局长领导的时候很重视、很支持做研究工作，这个在全国还是很少的。《出版科学》的出版其实是很艰难的，没有固定的钱，没有编制，开始连刊号都没有，但是他们坚持做这个工作。再就是我们学术的同行，尤其是武汉大学，他们有很强的力量，对我们华师也是很好的鼓舞、支持与帮助。因此华师出版社同仁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学习，要把华师出版社建设得稍微强一点、好一点，不做一些研究工作是不行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武大王余